



護台革命英雄謝雪紅揭碑典禮

暨追思大會

目次

新聞稿	1
追思會流程	4
台灣烈士謝雪紅追思紀念碑碑文	6
謝雪紅與台灣共產黨史略歷	8
認識我們	46





新聞稿

謝雪紅的一生反抗日本殖民、國民黨暴政與共產黨對她的思想再教育，是近代史上台灣人悲慘命運的縮影與拯救自己前途的勇氣實踐。台灣聖山設立謝雪紅紀念碑，乃是要追思謝雪紅為台灣前途奮戰，如同踩不死的野花，堅毅不屈的精神。紀念碑造型正象徵女性撐起一片天！

台灣歷史上，曾經出現一位傳奇女子，在日治時期的 1920 年代，就以社會主義觀點喊出「台灣民族」「台灣獨立」，她是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謝雪紅。

謝雪紅（1901-1970），本名謝阿女，出生於彰化北門小西，父母皆為文盲，家境赤貧。她 13 歲時父母先後過世，被家中長輩以「賣身葬母」的理由賣給台中洪姓人家當做童養媳，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被出賣。年紀尚輕的她，在洪家每天除了洗衣、煮飯、砍材、挑水、餵豬，還須負擔各

種雜事，從早到晚幾乎沒有片刻清閒，更遑論讀書識字。時常受到虐待的她，終於在 1918 年底，逃回彰化，結束 5 年的童養媳生活。

1919 年初台中富人張樹敏花錢贖下謝阿女，遭拐騙親事後她才發覺張樹敏已是有婦之夫。隨後張樹敏帶謝阿女到日本神戶，她在日本自修學習，正好看見日本窮人的革命運動。同年 4 月，兩人到中國青島，又遇到中國的五四運動，當她看到俄國「十月革命」鮮血灑在白雪上的照片，遂體認到人可以與命運對抗，革命



就必定要犧牲流血、付出代價，因此將自己改名為「雪紅」。

1921 年底謝雪紅離開張樹敏，應徵習得勝家縫紉機的使用、修理兼推銷員，她希望在經濟上能獨立、有自主性，免受男人的束縛，自由自在掌握自己的命運，後經營「嫩葉屋」裁縫店。同一時期更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演講活動，結交到當時的知識份子，由於嫩葉屋經營不易加上自己沒受過教育難以參與社會運動，謝雪紅苦尋學習機會，於是結束嫩葉屋，1923 年再次跟張樹敏到中國上海，並結識左翼青年林木順。

1925 年 4 月謝雪紅進入上海大學就讀，1925 年 10 月又遠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共產主義思想，擴張世界觀點。1927 年 9 月課程結束後，受第三國際指示籌組台灣共產黨，1928 年 4 月 15 日謝雪紅與林木順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地成立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其政治主張提出「台灣獨立」「成立台灣共和國」，此即謝雪紅往

後人生所極力實踐的理想。然台共幾天後即被日警破獲，由於謝雪紅無任何公開的讀書學習記錄，隨後被遣送回台灣。

1928 年 6 月謝雪紅從台北出獄後，積極想重建台灣共產黨，先是在台北開設「國際書局」販賣左派書籍，同時期也認識日後的革命伴侶楊克煌，並開始從當時兩大團體「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發展黨員，從事革命與婦女運動。1931 年日本發動台共大檢肅，謝雪紅被捕，判刑 13 年，關了 9 年之後，於 1939 年 4 月因肺結核保釋出獄。

1945 年國民政府代表盟軍接管台灣，謝雪紅看出陳儀政府的腐敗，藉由《和平日報》抨擊時政，並組織「人民協會」提倡民主自治觀念，及傳播「台人治台」「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思想。

1947 年台北發生 228 事件後，國府軍開始濫殺台灣人，在一片議和聲中，謝雪紅力排眾議，主張以武力對抗軍隊，



她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震懾牽制國府軍，使得台中市區死傷人數大為降低，並引誘軍隊至埔里郊區，最終在共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指示下，避走中國；同年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張台灣自治，也埋下日後她被中共整肅批判的伏筆。

1948 年謝雪紅進入中國，因具有強烈台灣意識，體悟到中共的治理方式並不適合台灣，總是與中共對幹，後來她甚至對毛澤東說，如果中共解放台灣，會發生第二次 228 事件！也由於謝雪紅始終站在台灣人的立場講話，不見容於中共，男性不服謝雪紅的領導，因此 1952 到 1969 年，謝雪紅屢屢被污蔑、批鬥，仍不低頭認罪。最終於 1970 年在北京隆福醫院的走廊辭世。

謝雪紅的一生反抗日本殖民、國民黨暴政與共產黨對她的思想再教育，是近代史上台灣人悲慘命運的縮影與拯救自己前途的勇氣實踐。台灣聖山設立謝雪紅紀念碑，乃是要追思謝雪紅為台灣前途奮戰，如同踩不死的野花，堅毅

不屈的精神。紀念碑造型正象徵女性撐起一片天！若問謝雪紅對後世的台灣有什麼啟發？就必須回到 1928 年台灣共產黨創立時的初衷：台灣民族、台灣獨立與建立台灣共和國。如同她的遺言：你們必須堅持戰鬥下去，最後勝利是屬於台灣人的！



<http://goo.gl/PnLiyP>



追思會流程

追思儀式

恭誦心傳雅集 10 遍

(第 5 頁)

歌詠禮讚

戰鼓聲響

謝雪紅烈士紀念碑揭碑典禮、獻花

(第 6 頁)

歌詠禮讚

來賓致詞

合照

享用餐點





心傳雅集

感恩、懺悔、慈悲、包容

祈禱、行願、天命、承擔





碑文：

台灣烈士謝雪紅追思紀念碑

霜雪傲骨雨夜花－謝雪紅

（1901 年 10 月 17 日－1970 年 11 月 5 日）

謝雪紅，社會主義革命家，幼時家境貧寒，被賣作童養媳卻不向命運妥協，接觸台灣文化協會並遠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1928 年組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隨即回台從事革命與婦女運動。1931 年日本發動台共大檢肅，謝雪紅被捕，判刑十三年。終戰後積極參與政治建設，組織人民協會與農民協會；1947 年爆發二二八，領導台中地區武裝抗暴，主持市民大會、組建二七部隊，多方交涉下，以和平方式將空軍三廠警衛權移交學生軍；國府軍廿一師登陸後，為避免戰火波及台中市民，轉移二七部隊到埔里，最終在共黨（台工委）指示下，避走中國；同年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張台灣自治，也埋下日後她被中共整肅批判的伏筆。1952 年整風運動，被打為反革命份子、1957 年反右運動被汙衊為二二八逃兵，開除黨籍；1968 年文革中，被紅衛兵抄家、批鬥、毆打，人生的終點，竟在北京隆福醫院的走廊。她的一生反抗日本殖



民、國民黨暴政與共產黨對她的思想再教育，實在是近代史上台灣人悲慘命運的縮影與拯救自己前途的勇氣實踐。

「人生應是不斷探求真理的旅行」是她常對革命伴侶楊克煌說的話。若問謝雪紅對後世的台灣有什麼啟發？就必須回到 1928 年台灣共產黨創立時的初衷：台灣民族、台灣獨立與建立台灣共和國。如同她的遺言：你們必須堅持戰鬥下去，最後勝利是屬於台灣人的！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2016 年 7 月 16 日





【推選文章】

落紅不是無情物，謝雪紅

（本文引自 2015/01/09【故事，臺灣吧】，作者張容兒。文末為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楊緒東醫師 2016/04/13 加註。）



乍看她的照片，你也許會好奇，這麼一個笑容可掬、溫柔婉約的女子，是如何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臺灣崛起，成為左翼運動的領頭羊？今天，就讓我們一同走進謝雪紅的人生，聆聽與她相關的時代故事。

1901 年 10 月 17 日，謝雪紅出生於臺中一個貧困的家庭。她原本名叫謝氏阿女，自幼便飽嘗被壓迫的滋味。十三歲那年，她被騙為妾，嫁給商人之子洪春榮。三年後，她逃家到臺南糖廠工作，結識了甘蔗委員張樹敏，又成了他的小妾。



這段新的感情，成為了她生命中的轉捩點。跟隨著張樹敏，她在 1917 年前往日本，在那裡待了三年。在這段時間中，她第一次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回臺以後，她在 1921 年加入了「臺灣文化協會」，開始走上政治的道路。

後來，謝雪紅和張樹敏又一同前往上海。謝雪紅在船上結識林木順，受其左翼思想影響，參與了上海「五卅運動」，又進入上海大學進修。

她當時的同學楊子烈在回憶錄裡是這樣形容她的：

她是台灣人，瘦長的個子，嘴裡鑲了一隻金牙……她對「表弟」是很嚴厲的，動輒咬牙切齒用台語斥罵。……大家不懂台語，見她橫眉怒目、聲調高亢，知道她又發了雌威。

這裡的「表弟」，指的就是林木順。透過這段生動的描述，謝雪紅剛烈的性情也躍然紙上。

之後，她更與林木順一同留學莫斯科「史達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全面學習社會主義思想，同時在那裡認識了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人。

謝雪紅與林木順回到上海以後，開始籌組臺灣共產黨。1928 年 4 月 15 日，臺灣共產黨建黨大會在上海正式召開。這是一個秘密的、有九個左翼運動者參與的會議，主席為謝雪紅。然而，他們很快被早已緊迫盯人許久的日本警方逮捕，謝雪紅被遣送回臺灣。這即是臺共史上有名的「上海讀書會事件」。

不過，謝雪紅並沒有因此放棄。在被釋放之後，她開除了在事件中畏逃者的臺灣共產黨黨籍，並在臺北建立「國際書局」，作為政治活動的掩護。在書局裡，謝雪紅邂逅了她日後將共患



難的終身伴侶——楊克煌。同時，她也積極參與當時已頗具規模的「臺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以進一步掌握領導權。

但是好景不長，1929 年日本共產黨遭到大規模逮捕，臺共霎時變得孤立無援。同時，臺共內部也充滿了內訌與派系鬥爭，給了日本警方可趁之機。1931 年三月開始，台灣共產黨面臨了一場空前絕後的大逮捕，謝雪紅也未能倖免於難。

她在獄中服刑九年，於 1940 年出獄。之後，她重新與先出獄的楊克煌恢復聯繫，並共同經營一家名為「三美堂」的百貨店。1940-1945 年，大概是她生命中最沉靜的一段時期。

然而，謝雪紅的社會運動生涯，並沒有因此劃上句點。戰後，她領導「人民協會」等組織，並利用《和平日報》抨擊陳儀政府和從事政治活動。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她也參與二七部隊，武裝抵抗國民黨政府。

在國民黨軍隊的掃蕩行動下，她與楊克煌南下逃亡，前往香港。在那裡，她依舊活躍於政治活動，在 1947 年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臺盟，並且擔任主席。

不過，她雖高居臺盟主席之位、擁有各項頭銜，但卻只能聽命於中共的指令。而反對派的人馬，也始終覬覦她的領導權，無所不用其極地攻擊謝雪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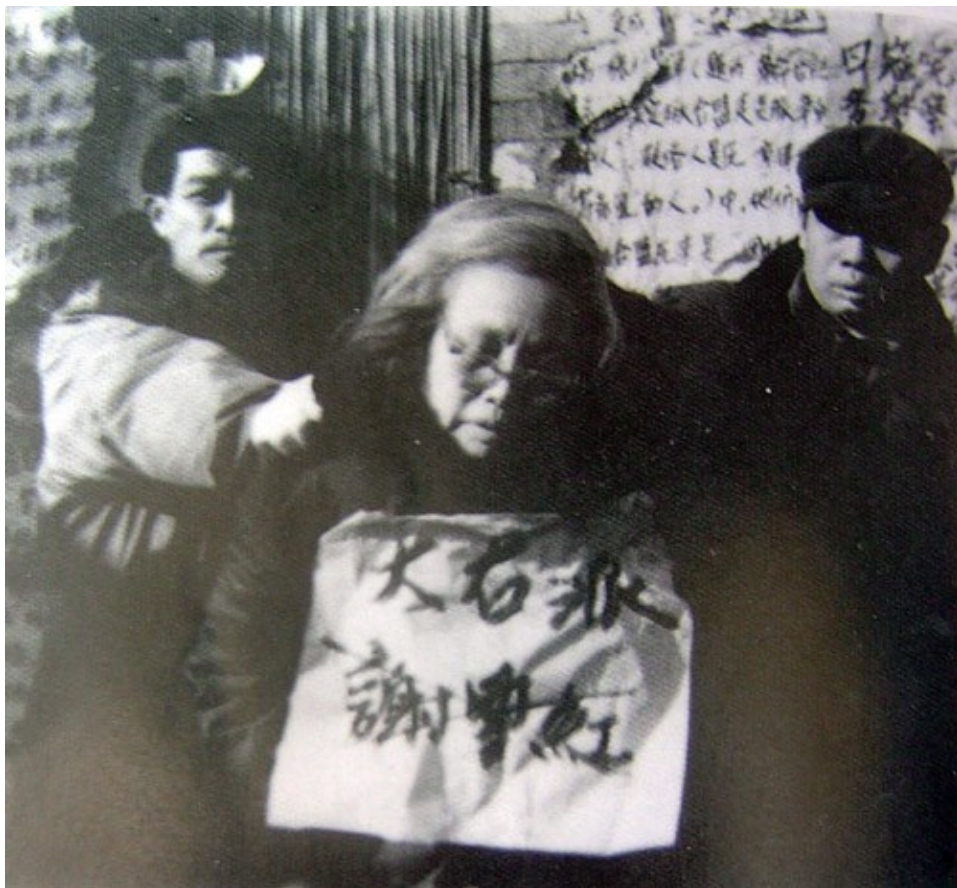
臺盟的內訌日益加深，謝雪紅的勢力不斷被架空。在 1952 年的整風運動和 1957 年的反右鬥爭運動的打擊之下，謝雪紅被批為「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勢力也全面瓦解。

1958 年以後，她與楊克煌徹底喪失領導權，過上隱居的生活。

然而，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卻不放過她，謝雪紅在精神與身



體上都遭受極大折磨。當時，紅衛兵來抄她的家，並勒令她下跪。倔強不屈的謝雪紅怎麼肯跪呢？於是，兩名紅衛兵便向後拉住她的手，用腳踢她的膝彎處，強迫她跪下。其中一個人按著她的頭說：「永不低頭的謝雪紅終於低頭了」



其實，謝雪紅哪有低頭呢？這朵驕傲的野花，終其一生，都沒有對誰真正低下頭來。

1970 年，患上肺癌、病情惡化的謝雪紅終於在北京逝世。八年後，楊克煌亦與世長辭。

直到十六年之後，中共才為謝雪紅平反罪名，並進行了骨灰移



放儀式。但這只是表面的平反，謝雪紅其人至今還飽受爭議，對她的評價在兩岸三地仍然眾說紛紜。

謝雪紅的生命雖然已宣告終結，但她所留下的影響，還存留在她同代與後代人的心中。就如她自己在面對著 1957 年的反右派鬥爭時所說的話：「我的價值是不可毀滅的。」

在波濤洶湧的二十世紀臺灣社會運動史上，她以鏗鏘不屈、傲雪獨立的姿態，永遠地佇立在時代的洪流之中。她的性別、身份、政治立場、生命歷程都如此特別；她和與她相關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都註定成為這座島嶼上的共同記憶。

謝雪紅已落。但她留下的精神，仍化作春泥，在這片土地中生生不息地滋長。

楊緒東醫師 2016/04/13 加註：

依我個人所見，謝雪紅的時代充滿不安和不可預想的變數，國民黨在台灣胡作非為，要在島內成立有組織的反暴組織很困難，而求助於海外，互信不足，力有不逮，遠水不及近火，此時有中國共產黨的絲毫援助，就如溺死前抓到了小草一般，覺得還有一些希望。

謝雪紅出身貧困，無法成就為留日本、美國……的高等教育份子，故她本身亦常常自謙，教育程度低，能受到中國共產黨重視，真是有愧於心，留學中國、俄國受到共產教育，亦是勉而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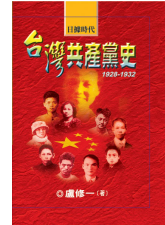
其實單憑如此單薄的台共成員，成不了大事，更因她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傾向台灣獨立自治，自然踢到鐵板。



書評：

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

——吾讀我見



（本文為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楊緒東醫師撰於 2009/08/08，推薦盧修一先生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一書，標楷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作盧修一簡介

日治時代的台灣共產黨，從建黨到瓦解，一直都是以隱晦、秘密的形式存在著。台灣社會似乎沒有多少人感知他們潛進、穿透式地串接農工群眾，批判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運動角色，積極掀起了台灣左翼運動的「革命」浪潮。

這本專書是盧修一在巴黎大學以法文寫成的博士論文，它的重要性，在於超越廉價的民族主義的解釋，真正落實到台灣社會去觀察台共成立的經濟基礎與歷史背景，詳載台灣共產黨的建黨、演變與毀滅。結實地填補台灣史研究一段被扭曲、污名、虛渺的活躍史實。

盧修一，2006，《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封底。

前言：

這本書會變成為盧修一被捉的原因之一，實在令人不解。

此書所述，皆是給 KMT 統治台灣，做指導棋，KMT 之妒賢如是，無怪乎 ROC 是鬼國。



甲午之戰，台灣成為日本領土，其殖民統治由嚴漸寬，中共想在台灣分一杯羹，宗主國蘇維埃不重視台灣，故中共對台有氣無力。

國共會談之後，KMT 落跑台灣，得美國之賜，佔得台灣，統治方式由騙、搶、奪、土匪方法，壓制歡迎回歸祖國的台灣人，其殖民政策就是軍管、228 大屠殺到白色恐怖，為保障少數特權，立法管束人民，過去如此、現在如此。

故苦思如何欺騙人民，到如何用金錢平撫民怨，成為德政，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只是手段變得細緻。

一個國家要獨立，必須有國際強權作為後盾，這是不爭的事實，而獨立建國的先決條件，就是大部分的台灣人，想要當家作主。

阿扁 2000-2008 執政，好像是台灣國獨立在望，可惜台灣人分兩邊，中國配合美國，兩強阻擾。

台灣人現階段要以自由、民主、人權來做全民教育，先了解何謂公義與公理，到現在，阿扁總統受到政治鬥害，司法成為殺人的武器，未審先押，打破國際人權公義，竟然還有人不痛不癢，認為阿扁有罪。阿扁總統之受到政治迫害，是台灣國的國恥，是國際人權的惡劣紀錄，談獨立建國的台灣人真是可悲。

此書所述的先人不論是台共、中共或是蘇共、日共，皆比現在的台灣人有 guts，KMT 對台灣民主人士的偵防無孔不入，要迫害台灣人非常容易，然而經過包裝加上統媒名嘴的胡說八道，會令人感到正義感十足。

一九七二年初，我在巴黎一個偶然機會裏，看到了日本人山邊健太郎主編的兩本有關日據時代台灣政治運動的史料集，赫然發現二〇年代的台灣人組織了共產黨，而且在距離今天的六十年之



前，就已經提出了台灣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的明確主張。這個發現非常有刺激性也非常有意義，因為那時候，我的政治理念已經很清楚地指向同樣的目標。當時我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很想針對台共問題做深入的研究探討，希望能把六十年前的這段台灣歷史，跟現代的台灣人追求自由解放的運動作一個結合；另一方面又擔心這種觸犯政治禁忌的研究，會影響到以後回台灣的工作和安全。

然而我又深深覺得作為一個台灣人，為什麼不能面對台灣的歷史？為什麼不能夠以台灣人的觀點、以台灣人的立場來詮釋自己的歷史？特別是日據時代的左翼運動，不僅當年遭受到日本統治當局刻意的鎮壓，就是在日本結束殖民後繼之而來的國民黨政府，對這段歷史更是刻意地加以封鎖、扭曲。面對這種不合理的壓制，如果一個知識份子不能勇敢地站出來，對這歷史從事一個客觀的、公正的研究，那麼知識分子的尊嚴要往那裏擺？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我終於決定以《台灣共產黨史》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個決定不僅符合我的心情，也符合我的理念。

一九八〇年底回到台北後，我繼續在文化大學任教，並擔任日間部政治系及夜間部行政管理系兩個系的系主任。我一直有個心願，想將博士論文翻譯出版，但是在繁忙的教務工作下，我始終無法抽出時間來做這件事。一九八三年初，我因為台獨案被判感化三年，我很想利用坐牢的時間從事翻譯的工作，只是參考資料不在手邊，無法進行，翻完導論之後，其它的就擱下來了。想不到法務部調查局竟然未經我的同意，在我坐牢期間逕行將我的博士論文翻譯出版，令我感到既憤慨又無奈！一九八六年三月期滿出獄後，我由別人手中輾轉拿到這本翻譯本，發現裏面有不少的錯誤，而且只翻譯了論文的本文部分，論文最重要的註釋和參考文獻都沒有譯出(事實上，調查局無法掌握參考資料，根本無法進行這部分的翻譯)。去年四月，時代雜誌鄭南榕先生到民進黨中央黨部來，談出版中文版的事，並要求馬上簽約。我因為工作非常繁忙，沒有時間，不敢輕言答應。今年年初我才開始著手翻



譯，然而鄭南榕先生卻在四月七日為了台灣獨立的建國理念而自焚，壯烈成仁！鄭南榕的犧牲加速我的工作，決心以這本論文的出版作為對他最高的紀念！

盧修一，2006，”自序”，《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自序5-7。

1929 年日本人的能源恐慌與現在的中共完全一樣，中共肖想台灣有阿九幫忙，甚為方便，日本害怕台灣為中國佔有，皆有盤算。

日本在一九二九年的世界大恐慌之前，就已經在一九二七年發生了昭和大恐慌，軍國主義與白色恐怖同時出現。因此日本社會內部的矛盾也越趨尖銳。為了減緩階級衝突的惡化，日本統治者遂加緊對殖民地的榨取，並進一步向殖民地以外地區，尋找新的原料市場。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殖民地的台灣，自然就遭受空前所未有的經濟掠奪。

一九二九年發生的世界經濟大恐慌，衝擊了全球各地的各個角落。捲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日本，更不能倖免。為躲避這場巨大的災難，日本軍國不能不更處心積慮要把本國的內部矛盾迫切轉移到海外。一九三一年終於爆發了「支那事變」，日本武裝侵略中國東北，也精心設計出一個傀儡政權——滿州國。可以理解的，日本統治者的目的，乃在於舒緩其政權所面臨的危機。

從政治史與思想史的立場來看，台共的建黨完成確實具有相當深刻的意義。在二十世紀，台共是第一個提出「台灣革命」概念與主張的政治組織，而且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台灣獨立」理念的政治團體。這兩個主張，又建基於「台灣民族」這個極富現代意義的國家意識之上。較諸當時的任何政治運動組織，台共的政治觀點，可以說非常精確，並且真正落實在台灣社會的格局。從思想史的立場來看，台共本身的孕育誕生，證明了二〇年代的台灣並未落於世界政治思潮之後。

陳芳明，2006，”陳芳明序”，《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



陳芳明序 10-11。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台共會失敗，當時的蘇俄不撐腰，台灣是美國的地盤。

台灣共產黨一直是以隱晦、秘密的形式存在著。從一九二八年的建黨到一九三一年的瓦解，在台灣社會裏似乎沒有多少人感知他們的活動。這種現象並不令人詫異，因為，台共本來就不是一個合法的組織，根本不可能以公開的活動來鼓舞風潮。台共的黨員，自始至終，都是採取化整為零的手法，附存於其他合法的政治團體，這包括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以及散佈各城市的工人組織。從表面上來看，台共並不具任何影響。然而，進一步深入觀察的話，就可發現台共成員在抗日運動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自一九二九年以後，台共的地位益形重要。這是因為右翼運動者陸續從文化協會退出，集結在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組織。這些右翼組織都傾向於體制內的合法改革，對於較為激進的鬥爭方式，全然摒棄不取。所以，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的責任，自然而然就落在台共的身上。

長期旅居日本的政治運動領袖史明，便是第一位深入剖析台共興亡過程的史家。他突破一般人對於右翼運動的高度評價，而站在社會主義立場肯定台共的歷史地位。在他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裏，史明特闢專章，對台共的政治、思想背景，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內部紛爭，並且對其最後終告覆亡的史實，都有詳細的討論。陳芳明，2006，” 陳芳明序”，《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 陳芳明序 12-13。

盧修一寫這本書，應該成為 KMT 的講師，不知為何要關他入牢。

《台灣共產黨史》，是盧修一在巴黎大學以法文撰寫的博士論文，原來的題目是《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一九二八~一九三二》。這份論文，曾經由孫亞光譯成漢文，是國民黨法務部調查



局授意的，並於一九八四年元月出版，非常諷刺的是，調查局人員在翻譯這部論文時，盧修一正在坐國民黨的監牢。

盧修一是在一九八三年被捕的，主要原因是他曾與史明有過接觸。事實上，盧修一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在資料與歷史解釋上，獲得史明的協助。因此，盧修一與史明之間的往來，大多是思想與學問的切磋。在戒嚴令當道的時代，任何有關社會主義思想的討論，以及任何觸及台共歷史的研究，都是被視為「非法」的。

歷來中國與台灣的官方史觀，都企圖要把中國的抗日運動與台灣的抗日運動聯繫起來。這種歷史解釋的終極目標，便是要擦拭台灣社會的固有性格，並進一步虛構台灣與中國是屬於命運共同體。

陳芳明，2006，” 陳芳明序”，《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 陳芳明序 14-15。

日本要台灣成為供給日本物資的供應地，初期打壓、後期寬容，頗有建設。

西元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這一天，是日本統治台灣的開始(日本人後來訂這一天為「始政紀念日」並集會慶祝)，日本人在台灣連續實施了八個月的軍事統治，直到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日成立台灣總督府為止。同時在這一天，日本帝國議會通過了所謂「六三法案」。

六三法案給予台灣總督完全的立法權和行政權，使他掌握最高的權力，可以做任何決定，並以「律令」作為統治的依據，因此他所下的決定就是法律。

該法成為日本在台專制統治的法律依據，同時也是「台灣一切惡法之所由來」。這激起了台灣人發起所謂的「六三法案」撤廢運動。



「保甲」制度和警察也同樣進行政治控制。一八九八年，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他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推動警察制度的現代化，這是日本當局一項積極的革新計畫。在新的制度下，一般警察在經常性的職務以外負有相當多的新任務。他們控制了戶籍和居所的變更、賦稅以及徵兵等等。依據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日本當局在治安方面比在行政上加倍用心。

日警對待台灣人相當嚴厲，但是日警極為有效的控制力的確強化了殖民統治，我們可以說日警是日本統治力量的脊柱。這種警察制度延續到一九二〇年秋季，才在第一個文人總督田健治郎任內獲得修正。但是警察的活動仍然遠超過法律的限制範圍，直到日本統治結束，情形始終如此。

在台灣人的眼中看來，日警就是所謂的「地下的總督府」。

日本的殖民策略目的在使台灣成為日本的後勤基地，因此重點放在使這兩個地區的經濟能夠互相整合。換句話說，台灣經濟必須成為日本的附屬經濟，以幫助日本養育逐漸成長的工業人口。

台灣對日本輸出米和糖，相反地，日本將工業產品輸往台灣，而且由於形勢使然，台灣的農業部門必須購買日本的工業產品以及附隨的各種服務。在殖民化的前十年，只有百分之一的台灣輸入品來自日本，而輸出品近百分之十則送往日本。但是一旦殖民化之後，因為資本的投入和先進技術的引進，農業的生產有大幅度的成長。農業生產量的增加很明顯地是由於日本農產品缺乏的緣故，這同時也增加了台灣的輸出數量。台灣和日本之間經濟的快速躍進，我們可以從台灣經濟中兩種重要產品輸出量的變化獲得證明：這兩種產品是米和糖。事實上，這兩種產品估計占台灣農業輸出量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每年台灣有百分之九十的糖向外輸出，而實際上台灣所有米和糖的輸出幾乎都是銷往日本。即使從台灣輸出後的剩餘產品最後還是輸往日本，因為台灣產品的分



配銷售都控制在日本人手裡。

盧修一，2006，”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7-10。

要矮化台灣人，就必須給台灣較低級的日式教育，當時能留日、留學的台灣人，皆大多為地主之子女，這批放洋的菁英，到了 KMT 時代，大多被 ROC 幹掉。

一九二二年以後，台灣人雖然能夠進入高等教育的圈子，但仍受到許多限制，這樣的做法無法再確保日本人的統治地位。一九二五年籌備、一九二八年開學的台北帝國大學，本質上仍舊是為日本人設置的。高等專門學校也仍舊由日本人壟斷控制，台灣人獲准入校就讀的機會相當有限。這反映出一個與經濟方面相同的壟斷現象，即日本企業大資本家和日籍職員在企業中往往占據了特權的地位。

總括來說，日本人在台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教育制度並且普及了教育，但是日本教育的特徵在於維護其高階層的統治地位。因此我們可以說，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日本人在各個層面都建立了他們的統治地位。

台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數目是相當有限的，也難以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公司中工作。他們成為「高等遊民」的菁英份子，背負著知識份子的重擔，成為反殖民主義的先鋒。

總之，日本統治政策的重點在使台灣從中國分離，以便與日本整合成一體，最後的目標是使台灣在日本的權威統治下成為一個堡壘，以便滿足日本的經濟需求，並利用台灣成為日本南進的一個中繼站。日本在政治上施行控制和壓制、在經濟上要求獨占性的臣屬、在文化上採取歧視態度等作為，都可以從這些目標得到解釋。

盧修一，2006，”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



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3-14。

日治時代台灣的民族性很強，自以為是中華民族，1921 開始，台灣人有柔性請願與剛性反抗兩股力量，挑戰日本人。

從一九二一年二月開始，台灣人開始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這是一個具有自治特徵的運動，為的是在日本統治下，台灣人民能夠獲得某些民政事務上的權力。換句話說，選出一個代表全島居民的立法團體，它的功能彷彿帝國議會的縮影，能夠公佈法律並通過總督政府的預算。這個運動和他提倡的觀念受到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廣泛的支持，再加上許多日本自由主義者和有影響力人士的幫助和鼓勵，使得這個運動持續了十五年。面對日警嚴格的控制力量，這的確是一項卓越的成就。

然而，帝國議會從未審查這些請願書，總督府對這個運動也一直懷抱著敵意。一九二三年年底，依據治安警察法，日本總督下令逮捕「台灣議會期成同盟」的會員及相關人士（這個同盟組織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底成立，但是三天後即遭日本當局禁止）。在被逮捕的人當中，約有一打人被起訴，這就是所謂的「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簡稱治警事件）。最後，蔡培火、蔣渭水被判禁錮四個月，蔡惠如和其他四人禁錮三個月，其餘則判處罰金或無罪釋放。

這個事件帶給日本當局意想不到的後果：即台灣人從此更積極地參與民族運動。這個事件使得部分積極份子瞭解到：政治運動如果獲得工農大眾的支持，便能夠給日本當局帶來壓力。有一部分積極份子開始思考馬克思主義，並傳佈推廣階級運動，因而造成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內部的分裂。

與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同一時期，「台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負責人同樣是林獻堂、蔡培火與蔣渭水。因此我們可以說，「台灣青年」、「台灣議會期成同盟」以及



「文化協會」可以說出自同一根源。

文化協會的實際目標在喚醒台灣人們的民族意識，並培養一種有利的氣氛以推展政治運動，他設立閱讀書報的場所，使人們能讀到報紙內容，特別是《台灣民報》，並組織暑期學校及夜間班傳佈知識。他們同時在城市和鄉村組織演講隊，演講的題目極為豐富：包括歷史、地理、自然科學、對殖民政治的控訴以及土地問題等等。這些作為喚醒了大眾、激發了農工運動，以及領導了青年運動。

文化協會密切地加強與東京和中國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之間的關係，以便喚起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和引導台灣人的政治意識，追求台灣的解放。

當這些運動逐漸擴大，並傳佈到日本、中國和台灣各地時，他們組成了支持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聯合陣線。但是當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興起，並影響青年知識份子以後，這批青年開始批評民族運動所採取的溫和態度，並對它產生的效果發生懷疑。年輕人當中形成一個新的派系，造成一種分裂局面，台灣的民族運動也因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盧修一，2006，”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6-18。

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理想，合乎台灣民主人士的要求，故參加台共的人也不少。

正當階級運動在台灣發展的時候，留學日本和中國的台灣學生也接受了共產主義的影響，開始進行左翼的活動。一九二八年終於在上海成立了「台灣共產黨」（以下簡稱台共）。台共在台灣成立了黨中央機關，逐漸地控制了台灣的左翼組織，但是它的活動發展情形以及所達到的效果，終於招來日本當局像對付其他左翼組織一樣的破壞措施。這些事件在以後的章節裡會陸續提到，它們



構成這本論文的主體部分。

文協左傾以後，包括林獻堂、蔡培火、蔣渭水以及其他人在內的民族主義派老幹部，秉持他們原先的觀點，決定離開文協。一九二七年七月，這些人組成一個新的政治組織——「台灣民眾黨」，揭示的指導綱領是「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及革除社會制度的缺陷」。

但是從民眾黨創立開始，它的內部就已經存在兩種意識型態不同的派系。一派抱持著爭取殖民地自治的目標，偏向合法而漸進的改革路線。另一派堅持為了實現自決可以使用革命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民眾黨所以能夠繼續存在，在於它能與急進份子妥協，這樣也使得民眾黨的領導權落入急進份子手中，它的活動也日趨激烈。一九三〇年，民眾黨內中產階級和大地主宣佈脫離，組成另一個溫和的團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盧修一，2006，「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徵與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9-20。

日本學生參加共產黨的人很多，台灣學生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參加在日本的共產黨，以茲發展台灣獨立建國理念。

當社會主義思潮瀰漫日本的時候，日本學生基於研究馬列主義思想潮流的需要，在一九二三年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這個社會主義團體，隨後於一九二四年年底改稱為「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這個聯合會擁有遍佈全國的五十八個支會組織，包括一千五百位會員。台灣學生在感受到這些社會主義團體的影響後，造成「台灣青年會」第一次分裂。社會主義潮流滲入了青年會，受到影響的主要人物包括：許乃昌、楊貴、楊雲萍、商滿生、高天成、黃宗堯、林朝宗和林聰等人。許乃昌於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大學就讀，稍後在一九二四年被當時擔任孫文政治顧問的鮑羅廷送往莫斯科，進入「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KUTV)受訓。許乃昌和同輩的謝廉清當時都是「上海台灣青年會」的領導人物，他



倆是鮑羅廷當時送往莫斯科學習的一百五十位學生當中的第一批台灣學生。當許乃昌從莫斯科東返後，於一九二五年八月回到東京，負責發展台灣人的共產主義運動，並且成為台灣人組成的社會主義團體的一個主要成員。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32-33。

毛澤東要台灣能獨立建國，對於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台灣人，鼓勵有加。

一九二二年以後，由於日本人在教育制度上的不公平安排，造成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無法在台灣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文協的活動與民族意識的覺醒相互結合，而與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產生關連，無可避免地吸引了許多台灣學生前往中國求學。他們或者偷渡到福建，或者取道日本再轉往中國沿海大都市就讀，包括廣州、廈門、上海、北京等。

日本在華南設有領事館，負有監視台灣人的任務，防止他們與中國人聯繫，日本當局懷疑台灣學生受到中國民族主義革命運動的影響，特別擔心他們回台推展共產主義。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36。

西元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間，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有了新的變化，在台灣內外台灣人左翼運動的影響下，原為統一戰線形式的民族主義運動，無可避免地面臨分裂的命運。這種情形，蔡孝乾在他的文章「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中有所指陳：

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主要在台灣的年輕人中發展勢力，它對在台的日本青年也產生影響，這些年青人當中出現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即一九二八年在台北成立的「第一線讀書會」。它與文協及農組都取得聯繫，儘管它的存在相當短暫，但「第一線讀



書會」為台灣人和日本人指出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上，他們可以採取共同的行動。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45。

西元一九二七年年底，兩個台灣共產黨人—林木順和謝雪紅結束了在莫斯科的訓練課程，攜帶第三國際要他們發展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並應服從日共指導的指令，返回上海。他們與日共聯絡，同時也與中共黨員翁澤生取得聯繫，以瞭解台灣和上海的情勢。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56。

由於民族和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先決條件，因此「工農政府」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應於適當時機提出。從對台灣經濟和政治情勢的研究出發，台共將台灣人分為九個社會階層：(1)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2)包括大地主在內的反動的資產階級，(3)進步的資產階級，(4)小資產階級，(5)大地主，(6)中地主，(7)自耕農，(8)貧農及農村工人，和(9)工人階級。

在社會階層中最窮困的要算是占台灣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和貧農，他們因此構成革命的主力。當然，工人階級應該構成革命先鋒。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外，我們可以說其他社會階級都具有反日的革命特徵，雖然工農革命力量對進步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構成威脅的時候，彼此可能會妥協，但是後者仍應該歸併於反動陣營。

然而基於實際的政治條件，工人階級作為革命的先鋒部隊，應該在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的時候，仍舊掌握台灣解放的領導地位。在我們所指出的台共政治方針這個基礎上，台共提出了十三項基本口號，這些口號和日共「一九二七年綱領」提出的口號非常相近：

1. 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2. 台灣人民獨立萬歲
3. 建立台灣共和國
4. 廢除壓制工農的惡法
5. 勞動七小時—不勞動者不食
6. 爭取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
7. 土地歸與貧農
8. 打倒封建殘餘勢力
9. 制定失業保險法
10. 反對鎮壓日、鮮無產階級的惡法
11. 擁護蘇維埃聯邦
12. 擁護中國革命
13. 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61-62。

關於土地問題，台共強調兩個重點：

- (1) 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台共提倡在革命者之間要有服從和聯盟的關係。確立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而農民是它的同盟軍。
- (2) 民主革命的主要社會成分是農民革命的實現，也就是消滅封建勢力，解決土地問題。換句話說，在民主革命的階段中，應該將封建地主的土地充公並分配給農民。

事實上，台共在「政治大綱」中指出，不只應該將充公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最後的目標應該是土地的國地化(土地應該屬於農民蘇維埃所有)，這樣的作法不只可以完全廢除土地私有制，最後還可以達到土地社會化的目標，目前提出「土地歸與農民」的口號，只是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有的做法；換句話說，當前台共要解決的農民問題，是屬於民主革命時代的農民問題，但同時應該為下一個階段—蘇維埃政權的階段預作準備。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63。



在一項討論到國際問題的特別綱領中，台共指出目前所有運動沒有關注國際問題的錯誤趨勢，這個趨勢造成運動的孤立現象。因此，黨決定推動負責日常鬥爭的各個系統組織，使工農大眾都能掌握國際相互支援的意識，藉著各種不同的國際性紀念節日來擴展黨的影響力。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66。

台灣共產黨，得不到國際蘇維埃的奧援，中共對台共的具體幫助，亦因為忙於國共戰爭而後繼無力。

台共中央委員會當時由謝雪紅、林日高、莊春火三人組成在一九二九年年初以前，只空有這個領導機關，缺乏堅強的實質組織，也沒有幾個黨員。但是，兩位候補黨員蘇新和蕭來福在日本四月十六日逮捕行動前，已應東京特別支部派遣回台，莊守也在被釋放後返回台灣。此外，居住在中國大陸參加中共共青團的王萬得、吳拱照、劉守鴻也相繼返台，並成為台共黨員。文協和農組的成員也陸續入黨，不僅增加了黨員的數目，同時也增加了台共的影響力。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逐漸蕭條，各地的無產階級運動也逐步獲得進展，這種情勢對停滯不前的台共發展相當有利。

盧修一，2006，”第一次破壞與黨的重建”，《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94。

喊口號是一回事，後台有金主撐腰才是實力，台共缺乏蘇聯的支持。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東方局透過中共的協助，以”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答覆台共的報告。這封信延伸了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採用的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理論，東方局強調：世界經濟蕭條日益加深，資本主義與蘇維埃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也日益擴大，同時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也加深了。新的世界大戰已無可避免，為了化解這個危機，資本主義國家毫無疑問地將加強他們的剝削與



壓制，這種情形因而有助於無產階級運動及解放運動的迅速發展。台灣是殖民地的一環，並不能避免革命鬥爭高潮的來臨，因此台灣的同志應該克服自己的主要弱點——諸如它們的被動以及缺乏組織和革命鬥爭的指導等，應該將少數人組成的小團體轉變成一個堅固而團結的共產黨組織，以便完成它最初的任務——領導台灣的工農運動，確保殖民地解放，並參加世界革命的陣營。在同一封信中，東方局列出聞名的十項基本口號，這些口號反映了國共當前革命階段的需要。

盧修一，2006，「第一次破壞與黨的重建」，《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12。

謝雪紅看出台共的弱點，主張利用適當機會來做社會運動，激進行為反而會被消滅，結果被除黨籍。

改革同盟的成立原本是基於第三國際的指令和中共的支持，因此，臨時大會的召開不僅象徵台共「激進分子」的勝利，更具意義的是，象徵了第三國際權威的維持與勝利。儘管謝雪紅曾赴莫斯科受訓，但由於她對第三國際的指令採取懷疑的態度，因而遭到開除黨籍。台共臨時大會的作法，就是要貫徹第三國際的路線與權威，任何反抗者不論所持理由為何，都必須受到制裁。就這一點而言，一九三一年在台灣海峽兩岸共黨陣營中所發生的結果，竟然是一致的。

盧修一，2006，「改革同盟與臨時代表大會」，《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15。

第二次大戰之前後，階段革命有其主要目標。

因此，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下，農民、小資產階級、工人大眾才是革命的推動力量。也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下「廢除民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政策，在農村及工廠內進行猛烈的階級鬥爭與武裝革命，才能完成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這份新的政治大綱和一九二八年的大綱有所不



同，在它的策略中顯示出三個主要目標：

1. 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台灣獨立。
2. 實施土地革命，消滅封建殘餘勢力。
3. 建立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

為了達到這三個目標，在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指導下，新的政治大綱將其政治策略濃縮為十點：

1. 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台灣獨立。
2. 沒收帝國主義者的一切企業和銀行。
3. 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農和中農使用。
4. 實施八小時勞動制，實施國家失業救濟、實施社會保險等制度。
5. 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實施統一累進稅制度。
6. 革命的言論、出版、罷工的絕對自由。
7. 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
8. 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9. 聯合日本、中國、印度、朝鮮的工農大眾。
10. 聯合蘇聯和世界無產階級。

新的政治大綱抄襲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有關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理論，它強調台灣的革命運動依靠著世界革命和台灣內部情勢的變化，這個運動將逐步發展，無可避免地應該會達到它的發展高潮。

盧修一，2006，「改革同盟與臨時代表大會」，《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16-117。

赤色救援組織運動給予革命者，有犧牲的代價，阿九若是賣台逃美，掌控黨、警、軍、特、憲迫害台灣人民，陷台灣人於浩劫，此種救劫之「人權律師」與救援團體就不可缺少。

現在阿扁全家受害，加上許多 KMT 造成的陳文成、林義雄、KMT 黨產、尹清楓命案…台灣人早就要覺醒。



「赤色救援會」是非社會主義國家內廣泛支援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組織。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召開於一九二二年，會中即決定創立救援共黨受難者的常設組織。一九二四年，第三國際第五次大會中確立赤色救援會屬於一個「非黨」性質的組織，並要求各國共黨予以支持，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莫斯科舉行這個組織的第一次世界大會。赤色救援會的角色不僅在幫助共黨運動的犧牲者及其家屬，並且以意識形態的宣傳來聚集各類「非黨」組織，共同對抗所謂的「白色恐怖」。

隨著反日社會運動的開展，受難者的數日日見增加，這種情勢導致一九二八年四月台共建黨大會通過有關「赤色救援會」的組織計畫。但是台共在建黨大會之後，隨即遭到第一次破壞，無法實際推動該項計畫。當時在台共影響下的文協和農組即企圖組織赤色救援會，後來因為這兩個組織的幹部被捕，使得赤色救援會必須迅速發生作用。

盧修一，2006，”最後的破壞與黨的重建企圖”，《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30。

三民主義信徒的蔣渭水，又能如何。

日本當局在採取行動對付台共之前，已經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台灣民眾黨第四次大會時將民眾黨解散。民眾黨的領袖蔣渭水是一位信仰孫文三民主義的醫生，他於同年八月死亡，他的死使民族主義運動受到致命的打擊，此後不再出現這類性質的運動。台灣的大地主雖然推動有限度的自治運動，舉辦象徵性的活動，然而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前，他們的活動也已告結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沒有一個真正的反日組織重新出現在台灣。

盧修一，2006，”最後的破壞與黨的重建企圖”，《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40。

理念可以騙人，真正執行起來，就必須殺人，全民共識，是必然



的和平手段。

第三國際從成立開始，一直寄望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運動，並且將民族解放運動視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列寧早已看出遠東地區的殖民地將是一個有利共黨滲透的廣大地區，因此在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中，決定組織一個「殖民地委員會」，並通過「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這個提綱為遠東的革命策略提供一個發展的基礎，又因為當時亞洲許多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傾向於共產主義和俄國的革命經驗，它在蘇維埃領袖的心目中更具重要性。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47。

實際上，台共放棄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含混態度，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與帝國主義妥協的反動團體，構成台灣革命的一個障礙；它同時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意念下，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與武裝鬥爭。

然而第三國際策劃的戰略最後並未能達到：事實上，改革同盟的成員遵從東方局的指示，排斥由謝雪紅指導的「關門機會主義者」的政策，在迅速擴大黨組織的目標下，遵循「開門的急進主義者」的路線，以配合「資本主義第三期」的新情況，這種作法事實上加速了台共的毀滅。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50-151。

和平請願失敗，方可以因此而擴大激烈的流血革命。

一九二一年台灣人開始進行一項自治運動，他們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要求設立台灣議會，這個運動受到日本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支持。自治運動於一九二七年遭到日共反對，當時認為這是一個傾向獨立的運動。在這之前，日共領袖佐野學曾



在東京青年會本部出版的刊物上發表一篇文章，呼籲支持台灣議會的成立，同時指出這是台灣人民走向自決的第一步。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52。

台共的領袖過於順從日共的指導，缺乏創造與獨立自主的精神，這些弱點謝雪紅是瞭解的。

此外，日共對台共的指導被證實是不充分的，這在謝雪紅心目中是台共落入「機會主義的錯誤」的第一個原因。

但是這種指導力量的不足從日共的立場來看是可以理解的，在警察有效而持續的壓制下，日共與台共遭受相同的命運，在一九三三年即告被摧毀。

依據我們的研究，日共似乎沒有對台共提供任何金錢上的援助，台共中央機關因為黨員有限，完全依靠台北國際書店的資助。台共在沒有其他維持生計的方法之下，應該會尋求財務上的支援，根據謝的說法，正由於沒有財務上的支援，所以台共無法召開大會以糾正「機會主義的錯誤」。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56-157。

當時的中國要台灣獨立，後來因為開羅宣言的假消息，加上 ROC 自稱為 China 的代表，才……

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台灣人曾經推動多種不同的抗日形式。這些抵抗運動觸及到台灣前途問題，民族主義運動者考慮到下面三種可能性：

1. 繼續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並且向自治的目標演進；
2. 回歸中國
3. 爭取獨立



第一項考慮是承認日本的統治，在合法的範圍內推動政治運動以實現自治的目標，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民眾黨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都依循了這個路線，但是，這些活動都暗含有台灣回歸中國的趨向。後兩項考慮則完全拒斥了殖民地政權，有時候他們的主張也相互混淆，認為台灣獨立是回歸中國的初步階段。

「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和「建立台灣共和國」這兩個表示台共基本方面的口號，造成各人解釋上的分歧。某些人認為這兩個口號如果與其他台灣人組織的口號相比較，是對台灣前途的一項清楚而明確的聲明；相反地，有人認為「獨立」這個名詞意指脫離帝國主義的統治，以及台共反對回歸到國民黨反動政權控制下的中國。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三年間，中共的黨領袖總是將台灣人民視為一個「民族」，並且承認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是一種「弱小民族」的鬥爭行動，這個鬥爭與中國的革命並不相同，而且具有潛在的獨立自主權。

有關中共支持台灣獨立的最重要資料，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澤東在延安與史諾(E.Snow)的一段話。毛在談話中，談到收復失土的問題：

「中國當前的任務在於收復所有的失土，而並非僅在長城這一邊保衛我們的主權，這就是我們應該收回滿州。可是，這裡並沒有包括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在內。但是當我們收復中國失土、重新獲得獨立後，如果朝鮮人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枷鎖，我們將熱烈幫助他們的獨立鬥爭行動。同樣的，這項原則也適用於台灣。」

獨立之路，這一點意義極為重大。然而，從一九四三年開始，中共的立場已有所改變，當時開羅宣言公開宣佈，台灣以及其他的



土地將歸還中國。從這個重要的日子開始，中共開始認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的一部分，從此拒絕台灣人的獨立自主權。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共特別強調台灣的解放問題，並且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60-161。

農民容易被利用，政客就是喜歡操弄農民當炮灰，不論農民如何成為建國功臣，到頭來皆為政客所殺害，全民的民主、人權、自由、法治，教育才是重點。

一九二六年中期，當各地農民組合以「台灣農民組合」名義組成一聯盟組織時，民族主義的分裂正迫在眉睫。因為日本農民組合和勞動農民黨的協助和支持，台灣農民組合的活動迅速地發展開來，這一點和其他台灣人組織大不相同。農民組合依循日本的行動模式放棄被動的請願，除了鼓勵農民大眾示威之外，並採取激進的行動。他們逐漸與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分道揚鑣，並和階級鬥爭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到了一九二八年年底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會員人數已達兩萬五千名，共有二十六個支部、四個區域性支部聯合組織。鑒於農組這樣的成長情形，台共認為「農民組合實際上已經成為台灣革命運動中戰鬥的、最大而且最鞏固的大眾組織」。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對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77-178。

一九三一年年初，農組中央委員會在嘉義竹崎召開秘密擴大會議，這個會議被稱為「竹崎會議」，由於農組中台共分子的努力，大會採用了「支持台共」的決議。農組自此成為台共的一個外圍組織。

然而，關於文化協會的解散問題謝雪紅和農組領袖早有歧異，一



九三〇年十月松山會議期間，激進年輕黨員的不滿削弱了謝雪紅的領導權威。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對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82。

勞工階級成為農民階段的領導幹部，中共利用以工農起家，工人成生產管理幹部，而農民卻再度成為農奴。

至於台灣工友總聯盟，台共尋求「由上層聯合」和「由下層鬥爭」的策略。換句話說，為了共同的鬥爭行動應組織一個委員會結合成總聯盟，同時派遣黨工進入工友總聯盟內部，爭取工人羣眾。由於黨員數目仍屬有限，且多任文協和農組職務，因此，要在敵對陣營內建立領導地位實屬幻想。此外，雖然民眾黨和工友總聯盟也強調聯合陣線的重要性，但就整體來說，其結果似乎一無所成。

盧修一，2006，”台灣共產黨對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影響”，《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87。

日本殖民台灣，逐漸把台灣人皇民化，對於人民的請願，採寬容的態度，給台灣人感覺到，漸漸與日本人平等的感覺。

日本殖民統治的五十年間，台灣人對日本人進行許多不同形式的抵抗活動，初期二十年的武裝抵抗失敗之後，抵抗運動改採一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出現，並由知識分子來領導。這些知識分子受到民主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並且受到自決思想的鼓舞。這批抵抗運動者均曾提出台灣解放與中國革命之關係的問題。台灣人的抵抗行動應該隸屬於中國革命之下，等待一個強大的中國出現來收復台灣呢？或者日本殖民統治的解放應該採用與半殖民地中國不同的革命策略，以瓦解日本的殖民統治，並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呢？

自從一九一四年同化會成立開始，經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直到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為止，它勾繪出一條接受日本統治並自我拘限於合法範圍內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是在全島未來自治的展望下，以改革殖民政策和改善台灣人地位為目標，是反抗異族殖民統治所遵循的第一條路線。

只有在一九二八年台共成立，這個時候，另一條路才明確地標示出來。從一九二七年的文化協會分裂開始，台灣人的解放運動開始出現階級運動和所謂的民族主義運動對立，並衍生一個新的趨勢，想藉革命行動推翻日本人的統治。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屬於這第二條路線。

盧修一，2006，” 結論”，《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95-196。

現代世界經濟不景氣，中共那一套大行其道，亦懂得如何與民主大國打交道，化妝演出種種，軟化身段，很得某些國家的歡心，台灣美國家族阿九，扮演中共行銷的推手，直接把台灣給賣了。

我們之所以注意到這些事實的存在，對諸君而言，是要指示其重要性，是為了要迅速確定的獲得戰勝的果實。諸君這種消極的表現以及被機會主義的毒素所限制住的心態，全是因為沒有清楚的意識到指導集體的革命鬥爭，擁有組織力量的人只有共產主義者，指導台灣的士人階級和農民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和台灣的榨取階級，能夠獲得最後勝利也只有共產主義者。所以，台灣的共產主義者有可能在消極中開始被分化解放。若非因此，這項任務的解決不會成為不可能，台灣革命運動也不會延遲吧。特別是現在，上至國際情勢，下至台灣島內的革命運動之條件看來，這種消極性是不會被允許的。就實際而言，現在國際帝國主義一切的矛盾，因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而越來越惡化，一方面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鬥爭，也覺得越來越激烈。因此，對新帝國主義之戰的釀成爆發是無可避免之事。

國際資產階級在遭遇此經濟危機時，變得更加殘暴，進行殘酷的鬥爭，圖謀殖民地以及勢力範圍的奪取。照此事實進行，對全世



界的政治環境帶來相當大的影響，而在各國勞苦群眾的面前背負了新的重大任務。

在另一方面，國際資產階級為了要從此經濟危機中逃脫，對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施加壓力，幾千萬的工人群眾被棄置置於街頭，因流浪和飢餓而痛苦掙扎。伴隨而來的，失業工人的人數最近空前增加，勞資雙方之間的矛盾，在各方面也顯得越來越複雜。

盧修一，2006，”附錄”，《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219-220。

台灣於國共會談開始之後，阿九已經被綁架，不得不 ECFA 一番，故到時候，台灣人民一翻兩瞪眼，事情大條。

在爭取群眾鬥爭方面，恐怕諸君非採取最大的積極態度不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以非常的強暴手段，諸君要利用此激發群眾的怨恨，擴大勞苦群眾的鬥爭，對此帝國主義的壓迫，非加反對不可。諸君，要利用勞資間、兵士和長官間、農民在土地上的一切衝突，組織群眾，非反對階級敵人不可。在日常的政治、經濟鬥爭上，要爭取勞苦群眾歸向自己，而且非把鬥爭往高層度的形式推進不可。

盧修一，2006，”附錄”，《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222。

後言：

帶賽、帶衰的阿九，成為台灣人的厄夢。

救出阿扁、回歸人權法治，台灣才会有希望，到 **Holy Mountain** 走走，亦可解解悶氣！

（撰於 2009/8/8）



讀書心得 1：

連戰、謝雪紅和天安門閱兵台

（本文為完整版，亦刊載於 2015/09/10 《自由時報》）

大地志工贊涅

看到連戰和一群「連戰們」在天安門的城樓上和習近平一起閱兵，不禁讓我想到在六十六年前在同樣的地點，一個台灣奇女子也曾站在毛澤東身旁，一同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典禮的閱兵，並參加第一屆的中國政協會議，名字還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董必武等開國元勳一起，名列主席團成員，這個人就是謝雪紅，而謝雪紅何許人也？

謝雪紅曾經創建主張「台灣民族」、「台灣革命」、「台灣獨立」的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在 228 起義中率先在台中戲院召開市民大會，組織二七部隊抗暴的革命英「雌」，雖然後來接到指示放棄武力鬥爭，離開台灣，遠赴中國，卻也成為後半生悲慘的開始，當然，她再也沒有機會回到故鄉！

在紅色中國底下，謝雪紅並沒有太多政治空間，她被迫放棄台共在殖民地解放鬥爭中的路線和主張（如台灣獨立）、失去革命論述力，必須將台灣革命放在中國革命的架構，台共不再有任何自主性，因為上面還有一個「黨中央」－中國共產黨。

謝在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並無幸免，韓戰後馬上面對整風運動，權力被架空，在如此的政治壓力下，她仍主張「台灣自治」；1956 年後的「反右運動」，又將謝批鬥為共產黨的叛徒、二二八的逃兵；十年文革中，謝在北京的住所被抄家，並在她一手創建的台盟前受公審、「坐飛機」、揪頭髮、毆打，讓這位「永不低頭」的謝雪紅，終於低頭。



這樣一個傲骨的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必須調整原來的主張，被當作政治花瓶利用，在沒有利用價值後馬上被劃作「右派」無情鬥爭，羞辱人格。別忘了她曾和中共開國元勳齊名，參加在天安門上的開國閱兵，而連戰在老共心裡又是什麼樣的貨色？可想而知。

自古以來台灣和中國沾上邊的事情都沒好處，甚至禍事連連，台史上從不欠缺台奸的角色，甚至有點多產！一個終身信奉社會主義、後半生服從中共領導的謝雪紅，下場都如此淒慘，可以想見，如連戰之流的政治衛生紙，在擦過老共的屁股後，怎還會被當作中南海的上賓供奉？

文革後的謝被平反，將其骨灰移到八寶山革命公墓，我不知道連戰的歸所在哪裡，不過我相信，在後輩台人唾棄的痰涎和幹譙中，少不了連戰的名字！

（撰於 2015/09/09）



讀書心得 2：

1947，紅白大對抗

大地志工贊涅

每當站在台中公園入口，望向自由路對面，曾經是謝雪紅的大華酒家和人民協會，1947 年的早春，並沒有帶來和平的氣息，戰後代表勝利者的新殖民政權－國民黨陳儀政府，種種倒行逆施，已讓台灣人在陰霾的氣氛中，點燃憤怒的烈火。謝雪紅，台灣第一奇女子，曾到紅色麥加－「史達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參與成立台灣共產黨，在如此詭譎的政治下，又該在歷史的舞台上，如何扮演誰都無法取代她的角色！

1947 年的二二八，透過電台放送，台北抗暴的聲響，鼓動全島，競相走告，緝菸事件，只不過是點燃引信的柴火，三月一日，台中縣市與彰化參議員召開聯席會議，派林連宗作為代表，支持台北行動，沒想到竟一去不回。當天在中央書局二樓，楊達等人印製民意小卡，準備做民意調查。三月二號，在台中座（台中戲院）召開市民大會，史上並無前例，後來也並未再有，擔任大會主席的謝雪紅，就這樣登上歷史舞台，直至人生最終的謝幕，在北京隆福醫院的走廊。當天下午，台中的仕紳們也仿照台北成立了「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

三月三日一早，楊克煌和謝雪紅成立「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作戰本部），各地方熱血的台灣人自動自發來此集結登記，等後命令，市民也自動送上米、酒、豬肉，並在台中醫院埋鍋造飯，婦女會和女學生則幫忙捏飯糰，分送給各隊民軍。傍晚在教化會館（今公園路和繼光街口處）發生了台中市有史以來第一場街巷戰，戰火波及旁邊台電，輸電線被打斷致使全市一片漆黑，原守衛在教化會館內的國民黨軍三百多人，聽到要以消防車噴射汽油火攻後，停止戰鬥全部投降。



前一天在台中郊區的空軍三廠，原為日本第三十六部隊駐紮地，廠長雲鐸責令台籍准尉李碧鏘，將李碧鏘提出的「三條件和平解決方案」，帶到台中師範學校與吳振武和在作戰本部的謝雪紅商量，如何避免學生軍和國民黨軍的一場火拼，吳與謝欣然同意。三日下午兩點，在李碧鏘帶領下，吳振武和謝雪紅同坐一台吉普車，後面兩台交通車，載著準備接手空軍三廠警衛任務的台中農學院和台中師範學生，進入空軍三廠廣場，學生軍和陸軍警衛隊在廣場交接後，台中市區絕大部分公家機關，都已被台中市民控制，直到十三日，國民黨土匪軍廿一師進到台中市前，市內已無戰鬥，而台灣人在這十天展現絕高自治能力，說明台灣人在政治上，絕不像國民黨宣傳的：「沒有政治人才，無法管理自己」。

吳振武何許人也？日治時期就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時遇太平洋戰爭，進入日本海軍預備隊第三期受訓，畢業後到海南島參戰，終戰時已升為海軍大尉，為台灣人官階最高者。在二二八發生前，中國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曾延攬吳振武入中國海軍，組織中國第一支海軍陸戰隊。不久發生二二八，也影響他的一生命運。

二二八時吳振武擔任台中師範學校的體育教師，二日曾接到電話前往和謝雪紅會面，被委任治安維持總隊長，在赴約會面前，吳振武曾詢問時任台中師範學校的洪炎秋校長該如何做，而洪炎秋指示須應付，並且先組織而按兵不動，再透過林朝權的關係向柯遠芬詳述情況。

吳振武和謝雪紅原本不認識，因二二八而結識，警衛任務儀交到學生軍的完畢後，在回台中市區的路上，根據楊克煌的回憶錄《我的回憶》中如此寫道：

在小汽車裡，吳振武默默無言，抓頭搔耳，許久才對謝雪紅說：「我在人家面前要表示反對你，請你原諒，……。」



另一段是這樣描述：

台中師範學生呂煥章跑到二七部隊告訴謝雪紅，他在司令部時被命令參加一個小組。這個小組成員有吳振武、一個特務和呂本人。他們的任務是要暗殺謝雪紅。

可見當時吳振武應該有接到國民黨情治系統的指令，轉達命令者最有可能的人選是當時台中師範的校長洪炎秋。經過幾日和謝雪紅的相處，發現謝並不是壞人，也同為台灣人和台中的和平做事，因此才有小汽車上請求原諒的對話。也不難想像三月五日的「吳振武槍擊事件」。

根據吳振武的口述，對於他的槍傷，他本人是如此描述：

惟在六日（七日）晚上，我自家赴學校途中，行經南台中馬小溝，突聞「砰」一響，正感疑惑之際，俯首一看，原來是自己左腳中了一槍，鮮血直流，即潛行至李外科醫治，隨而轉至別處療傷。

根據當時擔任戰鬥隊長的楊子榮口述：

當晚，吳振武擦槍，突然轟然走火，子彈擦過大腿，我和黃副官一同送他到李祐吉所開的外科醫院。吳氏在被送進病房前，一直說：「楊隊長，真抱歉。此後隊上的事要全交給你了。」自吳氏住院以後，我對外面要求我們前往救援的請求，一律拒絕。

可見當時楊子榮是將吳振武送到李祐吉外科的人，吳振武左腿的槍傷，應該是自己開槍或走火。

但也有另一種說法，我曾詢問吳振武的公子，是否知道其父吳振武槍擊事件，他向我表示：晚上時候，正當吳振武巡台中師範宿舍，被謝雪紅用四五手槍射擊。



此事我也曾詢問黃金島前輩，黃金島前輩向我解釋到：吳振武的大腿槍擊事件，應該是吳自己開槍，在醫院養傷時，黃還曾到醫院探望。最主要是接到洪炎秋轉達的暗殺謝雪紅命令後，發現謝雪紅並非壞人，殺謝和保謝的兩相矛盾下，才有這樣的舉動。其實在二二八中，吳振武也可以不必管事，因為二二八前一個月，就接到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的邀約，等到學期結束後，便赴南京加入中國海軍。萬萬沒想到會暴發二二八，本著台灣人愛鄉土的感情，義不容辭承擔責任，在吳、謝、李碧鏘和雲鐸的努力下，空軍三廠的警衛權移交給學生軍，台中市免去一場傷亡慘重的對戰。並將當時未成年的娃娃兵斥回，黃金島的描述，這些娃娃兵的身高，尚不及步槍的長度，更不要說正規的軍事訓練。

二二八後，吳振武仍在陳儀的通緝令上，是「一經發覺，格殺勿論」的通緝犯，經由林朝權和台北市警察局長陳松堅的保護下，趕赴南京海軍總部任職避禍。組織海軍陸戰隊期間，透過管道，將參與二二八而被追殺的台灣青年如黃金島、楊子榮、黃演廣、李碧鏘等人，邀請加入陸戰隊，但目的是躲避國民黨的追緝，敵大我小情況下，保全台灣同志。桂永清死後，保護傘消失，吳振武並沒有脫身，仍被以參與二二八而被台北保安司令部審問，半年後在林朝榮的擔保下才被釋放，而脫離軍隊則靠陳啟川的幫忙，最終才能全身而退。

吳振武是台灣人在白色祖國下的一個例子，在殖民體制下，無論是日本軍還是國民黨海軍，身上都有一個無法抹滅的印記—台灣人。在這樣的印記下，任憑如何努力，根不正、苗不紅，永遠就只是中國新主子的棋子，可貴的是吳振武在如此的時局，仍沒忘掉身上的印記。他與其兄香蕉大王吳振瑞一樣，因為台灣人的印記，身在殖民體制，兄弟同樣難逃被整肅迫害的命運。

謝雪紅又是另一種台灣人的命運。謝在三月四日接到李喬松與謝富傳達的命令，內容是黨（台工委）要謝雪紅交出武裝指揮權給處委會，下達命令者應為曾參加共產黨長征的台灣人蔡孝乾，謝



雪紅起初不同意，但無奈黨令如山。共產黨起初的態度並沒有打算武裝革命，也不知道台灣人如此迅速就能組織動員，並且成立軍隊，此時的共產黨，正在為國民黨準備包圍並攻占延安而焦頭爛額，哪還有力氣顧及千萬里之遠的台灣。所以中國官方宣傳二二八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完全胡扯。三月六日，原本日軍的第八部隊（干城營區）成立二七部隊。

三月八號國民黨整編廿一師登陸，從登陸之始便一路屠殺到南，三月十二日下午，二七部隊因為怕戰火波及台中市民，便撤退到埔里，打算在霧社建立武裝基地做長期抗戰，第一晚進駐埔里國小，隔天怕影響到學生上課，移師到埔里武德殿，中間謝雪紅曾到霧社尋求當地原住民支持，但無奈無功而返，霧社成立基地的計畫因而作罷。十四日謝富到埔里傳達台工委的命令，要求謝雪紅「黨員立刻停止一切活動，隱蔽起來，以保持組織的力量」。謝又被迫第二次和自己的抵抗戰鬥意志相左，但無奈黨令如山啊！十五日下午，謝雪紅、楊克煌和一些左派成員，便離開埔里。此時給周明（古瑞雲）的命令是：「解散二七部隊到小梅去」。古瑞雲和黃金島當時並沒有聽從，在謝雪紅一千人走後，當晚決定攻擊魚池派出所，夜襲從日月潭方向來的廿一師。隔天一早，便爆發烏牛欄戰役。後來中國共產黨批鬥謝雪紅的其中一條罪名「共產黨的叛徒，二二八的逃兵」，事實上，當時台工委的領導蔡孝乾才是二二八的逃兵，不僅如此，1950 年被國民黨特務捕獲，供出大批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員，後來辦理「自新」，加入中國國民黨，蔡孝乾才是真正中國共產黨的罪人，而他還是第一屆的全國政協委員。

謝雪紅、楊克煌和周明（古瑞雲）後來在蔡懋棠的幫助下，從左營軍港搭乘國民黨的光明炮艦到廈門，此時已經是五月二十二日，而台灣全島，正處於「清鄉綏靖」，許多台灣人正被國民黨屠殺，台中水源地、謝雪紅曾經住過的梅鏡堂旁運動場（台中市體育場），不知有多少台灣人，犧牲在殖民政權的槍口下。此時的謝雪紅不知，她所奔赴的「紅色祖國」，日後成為羞辱她的兇



手。謝雪紅和吳振武，紅色祖國和白色祖國下，台灣人被犧牲掉的兩種典型。

天大的遺憾、天大的不幸、天大的悲哀、天大的痛苦，謝雪紅、吳振武、台灣人，不經過這些，又怎能知道，祖國，不是白色、也不是紅色！天大，是謝雪紅的慣用語。也只有這樣「天大」的奇女子，才有膽在毛澤東面前對他說：「你們（中共）如果來臺灣的話，二二八事件會發生第二次。」

（撰於 2016/02/18）



一、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台灣神信仰」是一項進行中的社會運動，獨特性在於強調公義和台灣主體文化

由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世代楊緒東醫師於 1996 年創辦，宗旨在於推廣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並聚焦於推行台灣的文化與教育。

自 2004 年開始推廣「台灣人拜台灣神」運動，背後的精神意義有：一、歷史傳承的內涵；二、獨立建國的信念；三、實踐理想的意志。主張簡言之即是追求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此運動以 228 做為代表性的抵抗符碼，透過 59 位台灣神典範所歷經的時代背景、面臨的問題、事蹟與貢獻，做為認識台灣歷史的活教材，建立台灣人的自信心與自立的勇氣，深耕文化基礎。



出版書籍的社會運動，是以傳道的精神與台灣社會互動。

推動方式是運用台灣傳統信仰祭祀禮拜的習俗，強調信仰的神聖性，第一階段從 2004-2010 年，運用社會運動方式宣揚台灣神的事蹟，以做為記憶的召喚。第二階段由 2007 年底至今，建設「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的信仰根據地，以扮演記憶場域中界（連結、喚起記憶）的功能，透過莊嚴的儀式來強化 228 台灣神的神聖性。2014 年開始以出版書籍的社會運動方式，用傳道的精神與台灣社會互動。



二、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園區位於南投縣草屯鎮匏仔寮，自 2007 年底開始設置，是一個以信仰為出發點的紀念場域，園區以教育、歷史傳承為核心訴求。期望從這個園區出發，學習教科書沒有教的事，從最簡單的生活周遭環境開始，以最基本的鄉土單位著手而往外擴的同心圓方式學習。

信仰空間

228 台灣神聖碑所使用的素材為一重約 12 噸的台灣原石，是台灣東部海岸山脈的斑狀安山岩（俗稱麥飯石），原石的素材，不但見證過火山噴發，更是在炙熱艱困的環境中產生，象徵台灣神信仰的力量如同石頭般無堅不摧、屹立不搖，所遭遇的種種逆境，是要讓信仰更加穩固的試煉。

近 5 公尺高聳的台灣神追思牆，是一道以花崗石片砌造而成的高牆，雕刻有 59 位台灣神典範的姓名與生平年表在色系不同、深淺不一的花崗石片上，排列成凹凸不一的牆面，陽光照射下呈現自然的紋理及陰影的變化，代表台灣在民主路上的坎坎坷坷，建國之路不會是一路順遂，也必需要有努力不懈的心理準備。



228 台灣神聖碑



台灣神追思牆



紀念活動



主儀人帶領儀式進行
(2013 年)

自 2010 年開始在園區舉辦 228 追思活動，追思台灣神的犧牲奉獻，喚起台灣人的民主意識。2013 年開始，舉辦各類的紀念活動，除了把園區當成教育場所，更舉辦象徵性的儀式，強調儀式的文化現象，及其背後保存記憶的莊嚴性與文化抵抗，以台灣主體的觀點來詮釋歷史事件與創造新的意義。

永恆紀念豐碑



為大地董事&治史起造台灣國的張炎憲教授立碑



第一排左至右：

八田與一工程師紀念碑
林茂生博士紀念碑
泰源事件紀念碑
蘇東啟、蘇洪月嬌紀念碑

第二排左至右：

蔡同榮博士紀念碑
圖博英雄塔
鄭評烈士紀念碑
許昭榮烈士紀念碑
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



第三排左至右：

林冠華烈士紀念碑
鄭正煜老師紀念碑

第四排左至右：

人權救援先鋒梅心怡
(Lynn Miles)紀念碑
廖文毅烈士紀念碑



生態點滴

豐碩的生態物種，是園區的另一特色。有些物種的生態習性或棲地環境，需要無污染的大自然或人為干擾較小的棲地，尤其是能提供豐富的食物來源之處，聖山除了符合這些綜合的因素，尊重一草一木，與自然共存的环境態度，並以相信自然之中另有一個世界的「道在自然」，秉持以平常心欣賞萬物、尊重生命，當可以自由來去的蛙類和鳥類等動物逐漸現身，顯示生物安心居住於園區。



台灣擬啄木（五色鳥）
台灣特有種，留鳥。常駐於聖山聖殿前大草坡的大樟樹樹幹。



斯文豪氏攀蜥

俗稱肚定（台語），台灣特有種，台灣攀蜥中體型最大的種類。特色是領域行為明顯，藉由持續做出伏地挺身動作，將喉部擴張來宣示領域。聖山全山常見。



紅艷天牛

天牛界第一妖姬，特徵為鮮紅色的外表，多出現於中部。以荔枝的枯枝為食，生態地位是清除者。不定點出現於聖山。



雞肉絲菇

又稱蟻巢傘，野生食用菌，無法人工栽培，與白蟻有共生關係。常出現於 4-6 月的大雨過後。常見於聖山離農田不遠的草地。



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 路線圖

南投縣草屯鎮坪頂里股坑巷 30 之 57 號

(舊名匏仔寮，近南開科技大學)

049-2569645





聖山 附近地標與 GPS 經緯度

緯度：23.958046

經度：120.715874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謹製
2016年9月24日